臺大歷史學報第28期
2001年12月，頁233~242

BIBLID1012-8514(2001)28p.233-242

§研究討論§

俯瞰中國近代的新視角

溝口雄三*

一、引言
二、三個視角的交錯
三、中華文明圈的特性
四、所謂內發式近代視角
五、內發式近代的艱苦卓絕

一、引言

通常認為歷史學是有關客觀事實的學問，但正確地說，它是一門從過去的無數事實中選擇某種事實，再對選擇出來的事實進行某種組合，並對組合起來的事實給予某種解釋的學問。即是說，歷史學是一門有關事實的選擇、組織、解釋的學問。但是，這並非歷史家個人恣意的選擇、組織、解釋，就結果而言，它必須是歷史自身所發出的、屬於歷史本身的聲音。在十世紀以前，日本有一位有名的雕刻家——運慶，他以樹木為材料雕刻佛像。他總是這樣說：自己不是雕刻樹木創造佛像，而只不

* 作者係日本東京大學名譽教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過是把鎮坐在樹木之中的佛陀請出來而已。歷史學在終極意義上也是借助歷史家之手挖掘歷史自身脈絡的工作。並非歷史家選擇事實，組合它們並給予解釋，而是歷史的事實經由歷史家之手得以被挖掘出來，並呈現其以本來的立體形象，給人以某種啟迪。因此，歷史家必須具有一種沒有邊界的主體性力量：這是一種拋棄所有先人之見進入歷史的海洋，以聽取歷史的聲音為指歸的沒有主體的主體性。因為今天的討論並不是關於歷史學本身的討論，所以我不講更多的相關問題；我只是希望諸位事先瞭解，我今天講話的內容是上面所說的這樣一個前提下的選擇事實、組合並解釋它的一種新嘗試。而且我還要事先聲明一個立場，那就是我挖掘中國歷史形象的目的，是想要通過這樣的歷史形象糾正東亞既定歷史想像的扭曲之處，消滅伴隨這種扭曲的偏見、歧視和不平等。作為一個日本人，我要站在歷史家的立場上，通過使歷史自身進行敘述，以沒有邊界的主體力量，來承擔日本在東亞的殖民化與侵略的歷史責任。

二、三個視角的交錯

迄今為止，中國的近代敘述是以三個視角相互交錯的形式來選擇和組織事實，並進行解釋的。

第一個視角，是以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侵入中國做為中國近代開端的視角，可以稱之為資本主義視角。這個看法把鴉片戰爭視為中國近代的開端。對此，沒有必要多加闡釋。在這一百年裏，中國受到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一直在進行著以牙還牙的抵抗和反擊。在中國大陸，至今仍然持續著資本主義的滲透和傾軋的過程。

第二個視角可以稱之為文明視角，這是把自覺於西歐文明的威脅從而無可選擇地進行自我改革的過程，或者是抵抗和反擊西歐文明的過程作為近代的視角。這個視角產生了「洋務—變法—革命」三段論和視五四運動為啟蒙運動等等看法。在此，所謂「啟蒙」是立足於西歐近代市民革命的價值觀之上的。在五四啟蒙時期，嚴復的譯作《社會通詮》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發揮的影響很大。原書中「圖騰—宗法—軍國」三段論，被嚴復用來解釋中國的狀況，說「中國屬於七分宗法，三分軍國」，認為這相當於文明階段中的半開化階段，他意味著中國作為一個弱國不僅在歷史發展階段處於落後狀態，而且在文明史上也處於落後狀態。梁漱溟說在五四時期，對於中國民族文化的否定首次佔據了重要位置，這實際上是始於嚴復的。其後，有關東西文明的問題從各個不同角度被討論，而從中華文明的角度進行反擊的動向也不斷被強化，在二十世紀的後五十年，在企盼著東西方文明共生與融合的人們中間，反過來重新評價中華文明乃至強調它的卓越性的傾向更為顯著。

第三個視角是我希望建立的內發式近代的視角，對此我將在後面討論。在此，我必須先涉及已有的第三個視角，它是與內發式近代的視角正相對的，所謂腐朽王朝自我崩潰的視角。這個視角認為，資本主義近代所造成的中國的苦難，原因在於腐朽清王朝的歷史和文明的後進性。例如，在六、七年前中國出版的《中國科學史》，認為中國十六世紀以後自然科學停滯的原因在於清朝官僚制的僵化和腐敗。那種否定性地評價擁護清朝的洋務派和肯定性地評價試圖推翻清朝革命派的看法，就是立足於這個視角。迄今為止對於中國近代的看法，就是由以上三個視角，也就是資本主義視角、文明視角、腐朽王朝視角交錯而成的。

相對於上述既有的看法，我希望能夠去掉第三個有關王朝腐朽的視角。代之以內發式的近代視角，從而在資本主義、文明、內發三個視角的交錯點上考察中國的近代。那麼，內發式近代是什麼樣的視角呢？

三、中華文明圈的特性

在考察內發式近代的視角之前，我想先考察一下中華文明圈的特性。

中華文明圈的特性是它的長期穩定性，這是一目了然之事。但並沒有多少人是在與伊斯蘭文明圈相比較的時候得出這個結論的，幾乎多數都是不加質疑地相信一個現成的意象，那就是中華文明圈的穩定是相對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訊網

於歐洲文明圈而言的；與變化激烈的歐洲文明相比，中華文明圈缺乏變化。相對於從中世社會直筒一般綿綿延續從而導致了停滯。那麼，如果和伊斯蘭文明圈相比又如何呢？伊斯蘭文明圈在誕生伊始，就不得不腹背受敵地面對歐洲文明圈，背向印度文明圈。也就是說，它被置於與對等乃至優越於自身的鄰近文明圈的不斷抗爭之中。它的領域曾經一度向西跨越地中海延伸至伊比利半島，但是不久就退縮至非洲大陸北部；而另一方面，在二十世紀以降，它向東延伸至印度尼西亞。可以說，它完成了文明圈全體從西向東的大移動。與此相比，考察一下中華文明圈的情況可以發現，文明圈的中心中國從來不曾從中國大陸向外移動過，也就是說，文明圈的領域不曾有過移動；同時，中華文明圈自古與其他文明圈有過交涉，但是卻沒有與羅馬文明圈、伊斯蘭文明圈、印度文明圈等對立抗爭的歷史。而且，奇妙的是，在它周邊穩定的小王朝得以並存，這些小王朝及日本、朝鮮、越南等等在中華王朝的周邊得以持續從數百年到上千年的歷史。文明圈沒有發生移動，恐怕與地勢的條件相關。喜馬拉雅山脈和沙漠以及遠距離的地理環境，避免了中華文明圈與其他文明圈的衝突。此外，在其內部有著不具排他性結構而擁有融合性的儒教和佛教的文化圈，這也直接導致了穩定和持續。進而，朝貢貿易體系這一國際關係的彈性結構，催生了中心國與周邊國以及周邊國之間的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的關係。總而言之，與很早就分裂從而處於半崩潰狀態的羅馬文明圈、可以稱之為戰鬥的文明圈之流動性的伊斯蘭文明圈、作為異民族流動的異文明走廊之印度文明圈相比較，可以瞭解到中華文明圈的長期穩定性具有地勢上、結構關係上、內部構造上豐富的特性。把它僅僅視為「停滯」，這絕不是綜合性的、多元性的看法。

四、所謂內發式近代視角

在此，讓我們把目光轉向內發式近代。說實話，我並不願意使用「內發式」這個語詞。這是因為一個民族或者一個國家的歷史，無論是在該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民族或國家成立之前，還是在那以後，都是與其他民族和國家相互纏繞，或者是與其他地域相互間的交流的歷史。它是不能使用內與外這種靜止的固定的概念加以把握的流動性的存在。但是，在關於中國近代的看法一般性地被確定為視鴉片戰爭以後為近代，亦即西歐觸發了中國的近代的時候，我不得不在與其對抗的意義上使用相對於「外來」的內發式這個概念。因而，在此所說的內發式近代，是指在歐洲資本主義入侵之前已經在中國大陸內部釀成的中國歷史過程，我只是在這個意義上使用「內發式」這個概念。

讓我舉一個例子。清末的革命家陳天華，在小說《獅子吼》中舉出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的君主論，感嘆道：在早於盧梭進行了君主制批判的中國沒有發生市民革命，是因為在法國有幾十個人在盧梭之後繼承了他的工作，而在中國除了黃宗羲一人之外再沒有別人了。這是以歐洲近代為尺度衡量中國歷史的人所發出的嘆息。所謂中國沒有宗教革命、沒有市民革命、沒有產業革命，所以中國停滯不前者是也。的確，中國沒有那些革命，但是中國有別樣的發展。這種發展的路向，我稱之為內發式的近代，當然這不過是個取巧的說法而已。那麼，這種內發式的近代究竟是怎樣的呢？

還是舉黃宗羲為例吧。

首先，我們從陽明學開始討論。陽明學在歷史上被賦予什麼樣的特質呢？陽明學是一種把儒教道德，具體而言就是明太祖的〈六諭〉之孝悌道德廣泛擴散到民間，使民眾主體性地承擔鄉村秩序的精神革新運動。在道德秩序承載著政治秩序的當時中國社會中，它同時成為了一種政治革新運動。

這個運動經歷了一個複雜的過程，黃宗羲立足於知識分子的立場，在相對於中央專制而言的地方自治的方向上繼承了這個運動，從這一角度出發寫作了君主論。在現實當中，作為制度的地方自治被清政府鎮壓未能實現，但是在此需要加以注意的，是從十六世紀末開始擴展於南方中國的宗族性的結合。宗族結合是以孝悌倫理連接血緣關係，從而製造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集團性的相互扶助和相互保險的體制。其日常實踐的倫理是禮教。據說在北方中國多見宗教性的祕密結社，這亦是一種亞血緣關係的相互扶助和相互保險體制，它與宗教的差別是重義勝於重孝悌，但是，無論有什麼樣的差別，有一個事實是顯而易見的，那就是以民間的宗教、祕密結社為基礎，鄉紳和下層官吏、民間的實力階層等等中間階層一邊與地方官僚與中央權力溝通，一邊擁有相當的自治領域。例如，從地方的橋樑、灌溉等等土木工程，到家塾、鄉塾等等教育機構，乃至養老、育嬰、醫療等等福利活動，幾乎都是由民間的力量維持。這些本應該由政府擔當的地方公共事業，被民間的實質性自治活動所支撐。這種情況在中央政府那裏也被公開化，例如有些上奏要求各縣設置做為縣知事輔佐的鄉官，有些奏摺要求給予宗族內部的自主審判權等等。與明朝里甲制這一官制納稅體系的滲透相比，清朝的民間力量明顯地發展壯大了。正是這種民間力量導致了太平天國，同時也產生了為鎮壓它而設置湘軍、淮軍這種地方自治軍隊的需要。對於湘軍和淮軍的活躍，當時的革命派汪精衛說「取代滿人的中央集權，開始漢人的地方分權」，是正確地把握了事態的論斷。

黃宗羲就定位於這個地方分權化、進而展開了辛亥革命的各省獨立運動的源頭之處；在黃宗羲之後，以呂留良、曾靜為首，作為歷史的悖論，曾國藩、李鴻章，還有鄒容、孫文等等，成為黃宗羲之後的多個黃宗羲。

可以說，在十五世紀前後，官方所能主導的里甲制開始崩潰，由民間所主導的鄉村秩序開始建立和探索；逆向而動的明朝終於解體，順從了該趨勢的清朝得以承接其後。清朝在制度上鎮壓了地方自治，但是卻沒有妨礙以宗族為首的民間政治、經濟、社會力量的增強，或者不如說，與民間力量的互補性結合，是清朝的權力基礎。在這樣的情勢下，民間的力量與權力相呼應，逐漸增強了自身的實力，終於經由湘軍和淮軍的建軍完成了由民間控制軍事力量的過程，而王朝的專制性中央集權體制本身，也就到了終結的時刻。也就是說，中國的王朝體制由於內部的辯證法性質的歷史動力而瓦解，開始了新的分權式共和制的探索，這就是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

以上，是以「封建（亦即地方自治）論」的上下文所勾勒的一條歷史發展線索。除此以外，還有「井田（亦即土地均分）論」、以及「學校（知識人）論」等等歷史敘述線索，在此從略。

五、內發式近代的艱苦卓絕

在我看來，中國自從太平天國以來，地方分權的離心力不斷增強，就連洋務運動也在實際上起到了增強這種離心力的作用。這一離心現象，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在王朝末期肯定會出現，但是在俯瞰中國歷史的時候，不能忘記的是，歷史看上去似乎是在重複性地運動，但是歷史的性質卻在這種運動中大幅度地變化著。我把這種現象稱之為中國史中的螺旋型發展。就清末的趨勢而言，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從王朝內部產生了破壞王朝的顛覆性力量——湘軍、淮軍，它促成了省的獨立運動這一全新的型態。摧毀了明朝的李自成、張獻忠、吳三桂等，儘管是割據了地方的反亂軍，但是卻並不具有自覺的地方分權的方向性。他們只不過夢想實現上層王朝權力更迭而已。與此相對，清末的革命在政治結構上依據省的行政機構，同時力圖在體制上瓦解王朝的體制；另一方面，它依靠省的行政機構，不斷摸索著共和制這一新的政治國家體制。湘軍、淮軍以省為單位組織起來絕非偶然。鄉紳被稱之為省紳，本應是官營的保甲組織不知不覺之間變成了省的自治性公局，權力以省為單位得以分立。然後是省的獨立。這個作為行政機構的省的獨立，才構成了諸多王朝更迭歷史中清王朝崩潰的歷史特質。由於這個特質，使得清朝的崩潰不再是王朝的更迭，而是作為體制的王朝的滅亡，是中國兩千年來王朝歷史的終結。這是何等巨大的變動，是怎樣強調都不過分的。建立什麼樣的政治國家體制以取代王朝，這正是二千年以來前所未有的課題，它被提上了議事日程。在中國最為混亂和迷惘的十九世紀中葉，一個非常不幸的情況是，來自外部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這一個從未正面交過手的大敵，以佔有市場為目標而侵入了中國，致使中國的政治、社會、經濟更加陷入了混亂。並且，這種侵略同時伴隨著異質文明的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侵，這就是具有對於中國來說完全不同性質的原理（進化、弱肉強食），而且使得中國感覺到自己處於劣勢的西歐近代文明入侵。這種令人悲傷的狀況，就如同一條巨大的蟒蛇，由於兩千年來的脫皮，本來應該在洞穴中棲身養生，從而使自身得以復甦以新的姿態展露於世，但在事實上這條巨蟒卻沒有得到瞬間喘息，反而暴露於荒野而不斷遭到猛獸襲擊，被咬噬得千瘡百孔。

但是，我們在此也應該注意到，儘管中國一時處於悲慘的境地，不過由歷代王朝承繼下來的「天」的統治理念（民以食為天，均貧富、萬物所得）卻經由諸如清末的大同理想、孫文包括民生主義（四億人的豐衣足食）在內的三民主義，以及其後的社會主義理念等等，在不斷變化結構方式的情況下基本上得到了傳承。這反映著一個事實：作為統治理念的「天」，實際上是民的聲音。在中國，天的統治理念，本來就具有社會主義的性質，換言之，社會主義的理念對於中國人民總體的生存來說，不是可以輕易破壞掉的東西。

就結果而言，脫去了王朝體制之皮的巨蟒以人民共和制社會主義國家的型態復生了。儘管它承受了資本主義（帝國主義）、西歐文明的諸多介入而不得不接受不曾預料的變形，但是那怕是以否定的型態，中國仍然繼承了它應該繼承的，中國做為中國而再生了。

中國在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前半期，在歷史上演出了一幕壯大的王朝體制崩潰和社會主義人民共和國新生的時代劇。按照舊有的看法，這幕劇被解釋為落後於世界文明史的腐敗王朝，受到了外部資本主義、西歐文明的衝擊，被終於覺醒的革命先覺者推翻。毛澤東使用人民的力量亦即人民史觀來解釋它，這就是人所周知的人民對於與皇帝、地主的封建勢力相勾結的帝國主義勢力所進行的反帝、反封建的鬥爭這種解釋歷史的模式。毛澤東的這種人民史觀的歷史解釋，是依靠我在開頭提到的資本主義、西歐文明、腐朽王朝這三種視角的交錯來選擇事實和組織材料的。對於人民來說，以清朝為代表的歷代王朝權力全部是否定的對象。現在，毛澤東的歷史觀念在日本幾乎沒有人附和，但是在考察中國近代的時候，在資本主義、文明、腐敗王朝三個視角的交錯之中選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組織和解釋事實的人，在日本恐怕依然是大多數。

舉例言之，就甲午戰爭的評價而言，把它視為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亞洲的第一步和視日本為對付俄國南下而進行的衛國前哨戰，這兩種看法所採取的立場儘管是對立的，但是在視清王朝為腐朽王朝這一點上，其視角是相同的。這種視角認為，清朝是腐朽王朝，所以在資本主義化方面落後了，而在接受西歐文明又採取了頑固的保守態度，由於其落後和頑固才導致了清朝的失敗。這是一個複雜而龐大的問題，所以我在此不做討論。我在此只是希望指出一點，有些問題是被上述視角所遮蔽的。例如，日本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前半期得以侵略了中國，其最大的要因是否真的是由於日本早期的資本主義化獲得了成功？是否能夠解釋為中國恰巧處在置身荒野尚未完成脫皮之時，日本抓住了這唯一可能乘虛而入的好時機鑽了一個空子？抑或是兩個要因的結合？如果是兩個要因的結合，那麼它們之間的結構關係又如何？進一步而言，在近代的過程中，日本選擇了天皇制和資本主義的道路，而中國選擇了共和制和社會主義的道路，與它們各自十六世紀以降的歷史脈絡之間的何種差異息息相關？我們以怎樣的歷史視角俯瞰這些差異才是有效的？我想，這些問題都是應該在今後加以深入討論的。

總而言之，我在中國歷史的脈絡中設置考察視角加以思考，得到了這樣一些基本的認識：中國在它自身最困難的時期，終於成功地對外戰勝了西歐和緊隨其後的日本，對內則既維護了內發式近代的主幹（統治理念），同時又試圖通過不斷攝取西方文明，並反過來使自己的文明原理得以再生；與此同時，中國既通過社會主義的體制對抗資本主義，同時又接受資本主義以超越社會主義的意識型態性，現在也正處於以克服資本主義、文明、內發這三重困境為指歸，面向新的世紀尋求新的發展的階段。

以上，我提示了從資本主義、文明、內發這三重交叉視角出發思考中國近代的基本看法。可以預期的是，中國的歷史形象將在眾多人的眼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中按照它自己的脈絡呈現它的姿態，據此而使得世界史恢復更為豐富的狀態——這將成為二十一世紀的課題。

*本文初稿曾在「東亞近世儒學中的經典詮釋傳統」研究計劃第6次研討會宣讀，2001年5月12日，臺灣大學。

（責任編輯：查　忻　校對：李浩德）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